长征，震撼寰宇的伟大壮举

本报记者 赵相康

90多年前，中国工农红军以钢铁般的意志，完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震撼寰宇的伟大壮举——长征。

1934年至1936年，在民族危亡、革命遭挫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路红军为粉碎敌人“围剿”、保存革命力量、肩担北上抗日的使命，毅然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途。

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红军纵横驰骋15省（区、市）。六万五千里，是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4路红军在枪林弹雨中走出的气吞山河的英雄诗篇。从瑞金出发到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他们跨越近百条江河，征服40余座高山险峰，穿越被称为“死亡前狱”的茫茫草地，冲破百万敌军层层围追堵截，以巨大牺牲完成震撼世界的万里远征。

这场伟大胜利，彻底击碎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我党和红军的图谋，宣告了肩负着民族希望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长征，留给后世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长征胜利九十载，镌刻着革命先辈英勇足迹的一件件红色物证、一个个红色遗存，不仅留存着军民同心的滚烫记忆，更是伟大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实物注脚。

九十载风雨兼程，长征精神历久弥新。循着红军足迹采撷红色往事，用一场跨越万里的联动，以一件件文物回望峥嵘岁月。重温这段壮丽史诗，就是传承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人民情怀。

时代考卷常新，长征未有终点。让我们在一个个承载着长征精神的红色文物故事中，汲取跨越万难的磅礴力量，昂首奋进新时代的长征路。



江西

吃水不忘挖井人

江西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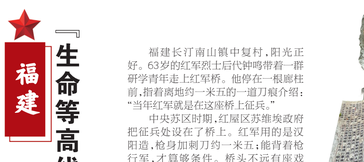
小学语文课本里《吃水不忘挖井人》的故事，陪伴井冈成长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1933年，毛主席在瑞金沙洲坝领导革命期间，见当地村民饮水艰难，便带领军民开挖水井，解决了乡亲们的饮水难题。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后，国民党反动派很快占领了中央苏区，实行归色恐怖。对毛主席带领群众打下的这口水井，他们先后5次强行填埋，妄图湮没共产党与群众的这条情感纽带。

68岁的红军后代、沙洲坝义务红色讲解员杨小春介绍，沙洲坝群众斗智斗勇，他们夜晚悄悄地自发清淤挖土、修复井台，上演了“敌填我挖、屡填屡修”的“游击战”。

“老百姓之所以拼了命也要守护这口井，就是要守住与共产党的情感联系，因为他们知道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幸福、办实事的。”杨小春感慨道。一口红井，承载着苏区人民对共产党的绝对信任与赤诚拥护。

新中国成立后，这口历经风雨的水井也迎来了它的新生。1950年，为迎接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革命根据地访问团的到来，沙洲坝群众自发修缮了水井，正式定名为“红井”，并立牌镌刻“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以此寄托对毛主席、对红军的感激之情。由此，1951年10月1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在第1版上刊发了一篇标题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图片报道，成为家喻户晓的《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篇课文的源头。



红井景区雕塑。资料图片

福建

『生命等高线』刻下群众参军热

本报记者 彭玲

福建长汀南山镇中复村，阳光正好。63岁的红军烈士后代钟鸣带着一群研学青年走上红军桥。他停在一根圆柱前，指着离地约一米五的一道刀痕介绍：“当年红军就是在这座桥上征兵。”

中央苏区时期，红屋区苏维埃政府把征兵处设在了桥上。红军用的是汉阳造，枪身加刺刀约一米五；能背着枪行军，才算够条件。桥头不远有座戏台，演节目、搞宣传，动员青年参军。闽西民谣唱：“人有枪高当红军。”

最早这道线是用笔画的，后来刻进木柱。个子不够的后生，往鞋里塞纸、鞋底绑草，有的趁夜把刻痕往下改。他们知道，过了线就要上战场，可报名的人还是一个接一个。如今这条不起眼的划痕，被称为“生命等高线”。

桥中间挂着展板，讲述罗云然一家的故事。1929年红军分田分地，老人先后送4个儿子参军，4人全部牺牲。1934年松毛岭战斗惨烈，他又把最后两个儿子带到桥头。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察信书劝他留一个，老人没答应。他说，红军来了，家里才分到田，孩子才活下来；就算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走。

离桥不远，观寿公祠前立着石碑：“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石碑。网络图片

“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村中观寿公祠前集结誓师，迎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步。中复村作为长征四个出发地之一，是距长征路程点最远的一个出发地，被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零公里处”。

当年，红九军团从这里出发长征。中复村先后有2000多名子弟参加红军，最后活着回来的仅有6人。

钟鸣讲到这里，停了一下。他说，红军为穷人争活路，穷人才把亲人交给红军。

广东

《当红军歌》传唱至今

本报记者 赵相康



上朋村《当红军歌》题壁。网络图片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广东省韶关市南雄市油山镇上朋村徐氏祠堂门廊左侧墙壁上，一方玻璃保护罩内保留着一处高1.5米、宽1.4米的手写歌谱——《当红军歌》。

1934年，中央红军从江西千都出发，于10月25日进入广东南雄境内。红军在粤北共计21天，先后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二、三道封锁线。

“这是南雄目前发现的唯一一首有曲谱、有歌词、能传唱的完整红军歌曲。”南雄市史志办主任黄树材介绍，红一军团取得长征入粤第一仗新田战斗的胜利后，来到上朋村休整宿营，红军书写标语、作动员宣讲，教唱《当红军歌》，号召村里年轻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据《上朋村志》记载，1929年至1934年，红军曾多次在上朋村活动，写下了这首歌谣。长征期间，红军离开上朋村后，村民用稻草和黄泥盖住词曲，才把它保留下来。

据了解，红军到达粤北时，粮食和物资消耗较大，急需补充。夺取城口后，红军开展打土豪劣绅运动，征用或没收土豪劣绅的物资和金钱以筹集军饷，还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向当地群众购买粮食、蔬菜、柴草等物资。

红军纪律严明，征用群众物资均按价支付，主人不在时便将钱款放其屋里、柴草堆旁或菜地上。红军亲民爱民受到群众称赞。

这首《当红军歌》不仅传唱至今，还被编入油山镇小学的校本教材。

湖南

一条被子，半条相赠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梁可庭 通讯员 唐聪



“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谢鹏博 摄

秋日的湘南，群山霞翠。湖南省郴州市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展厅里，一床白底红花、打满补丁的旧棉被，静静陈列在展柜中。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长征经过汝城，驻扎在沙洲村一带休整。当时，不少村民因听信谣言，躲进了深山。

村民徐解秀因为孩子小、襁着小脚走不动，没有进山。红军进村后，借住进了她家的破旧堂屋。3位蜕盛的女红军与徐解秀挤在一张床上，盖着这一条仅有的棉被，度过了寒冷夜晚。

徐解秀晚年回忆，临别时，一个女红军执意要把被子留下来，徐解秀说什么也不肯收。推让之间，女红军拿出剪刀，将被子剪成两半，一半塞进徐解秀怀里：“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回来看你们！”

可惜的是，那3位女红军，此后再也没有回来。徐解秀守着那半条被子，一等就是几十年。她常常对人说：“共产党员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一条被子，半条相赠，诠释的正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如今的沙洲村，早已告别了当年的贫苦。依托红色资源，沙洲村大力发展红色旅游和特色种植，昔日穷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红色打卡地。

如今，以“半条被子”为主题的宣讲活动走进了机关、学校、社区和军营，这床棉被的故事，已经成为一股生动的竞课，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广西

乡亲自发保护红军标语

广西云云—广西日报记者 施洋洋

广西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干祥村，一栋青砖灰瓦的两层小楼静静矗立在村口，这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军标语楼。

这栋标语，曾在墙壁中深藏了54年！

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介绍，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湘江战役后，来到老山界脚下。1934年12月初，红军在干祥村一带宿营。休整间隙，宣传战士识墨为了，在干家寺的粉墙上“刻”下了一条条滚烫的标语：

“红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

“当红军有田分”

……

兴安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讲解员赵佳娜介绍：“当年各连队要求能写字的战士每天至少写一条标语，多则三五条。宿营地的墙、休息处的石头，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还要看宣传对象——对老百姓写什么，对瑶族同胞写什么，对白军士兵喊什么话，都不一样。”

干家寺这栋楼最早是瑶，后来改成学堂，还做过宿舍。1988年冬天，楼里发生了一场火灾，火扑灭后，墙体因热胀冷缩，表面的石灰浆爆裂脱落，赫然露出三个字：“红军宣”。

时任乡党委书记立即向上汇报，县博物馆工作人员火速赶来。他们小心翼翼地揭下墙面上的纸筋白灰，一层又一层，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红军标语，越揭越清晰。



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广西日报供图

原来，当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卷土重来，下令铲除所有标语。乡亲们用纸筋白灰，一层层糊上去，把那些滚烫的字句封在墙里。

经专业人员请理考证，千家寺红军标语楼共发现21条文字标语和一幅浸画标语。

今天，人们将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这条小道，亲切地称为“毛泽东小道”。

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的马灯。遵义会议纪念馆供图

贵州

一盏马灯照亮前路

本报记者 赵相康



遵义市苟坝村的红军马灯馆，存放着一盏复制的马灯。当年苟坝会议召开期间，正是这盏小小马灯，陪伴着毛泽东沿着漆黑的小路前行。

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被迫转战贵州。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取得遵义战役胜利，但蒋介石仍布下天罗地网企图围歼红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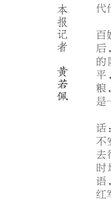
1935年3月10日，中央红军进驻苟坝村，红一军团发来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认为黔军防守薄弱，可借此补充物资。当时参会20余人大多赞同出战，唯有毛泽东坚决反对。

深夜，在苟坝村岭崛狭窄的小道上，毛泽东手提马灯赶往周恩来住处，劝说暂缓下达作战命令。恰在此时，军委二局破译敌军密电，证实将分有已向打鼓新场增派兵力，各路援军正急速靠拢，完全印证毛泽东判断。次日清晨，继续召开会议，众人认清局势，决定放弃进攻计划。

为提升军事决策效率，3月12日，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统一指挥全军作战。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思想原则，让此后的中央红军一路奇进，顺利渡赤水、过马迁，兵临贵阳，调出滇军，继而挺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成功甩开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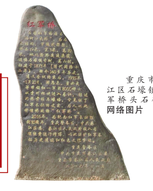
今天，人们将毛泽东同志走过的这条小道，亲切地称为“毛泽东小道”。



重庆

萝卜坑里的铜钱代代传

本报记者 黄芬佩



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红军桥头石碑。网络图片

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的村民丁大乾家中，珍藏着一批传承90余年的老铜钱。铜钱边角早已磨损，静静诉说着当年红军军用萝卜、土沟深钱补偿的旧事。

石壕镇地处渝黔交界，是中央红军长征过境和转战地。1935年1月21日，红一军团长征途经此地。因蒙绅散布谣言，不少村民纷纷躲进山中。丁大乾的祖父母丁运柳、穆国伦因行动不便，留了下来。

几名红军来到丁家，询问能否购买一些粮食。得知丁家无余粮后，战士看向屋旁的坡地，询问道能否授些萝卜。征得同意后，他们拔了几颗萝卜，把玉米秆铺在田边就地歇息。两天后，丁大乾的父亲丁正海返回家中，看到地里缺了几颗萝卜，却在萝卜坑中摆到了铜钱。拨开玉米秆，又见一包棕叶裹着的铜钱。红军就用这种方式，为取用的东西付了钱。丁家也把红军留下的铜钱一代代保存下来。

当年过境石壕的队伍繁杂，百姓常觉惊扰。但红军进驻石壕后，百姓看到的是一支完全不同的队伍，不仅秋毫无犯、买卖公平，还主动帮群众劳作，开仓分粮，用实际行动让群众认识到，这是一支真正为了人民的队伍。

石壕一带还流传着几句老话：“石壕哪年不过兵，过兵百姓不安宁，唯独当年红军过，一来一去很清静。不拿东西不拿钱，走时地下扫干净。”朴实的民间俗语，道出了老百姓对严明纪律的红军最真挚的认可。

云南

『去而复返』的八音钟

云南日报—云新闻记者 张雁群 蔡飞



陈列于红军长征树波纪念馆的八音钟。云南日报-云新闻记者 蔡飞 摄

云南省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树波镇八桂村藏在大山深处，91年前的一个夜晚，在该村何家大院召开了一场载入史册的会议。

彼时，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数十万追兵围追堵截，金沙江天险横亘眼前。1935年4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30日傍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军委纵队进驻丹桂村。在何本恩家四合院里，召开历渡金沙江的部署会议。

会后次日凌晨，刘伯承率先进部队从丹桂村出发，急行军一天一夜，夺取了金沙江畔的皎平渡。大部队随后赶到，昼夜过江。至5月9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渡过金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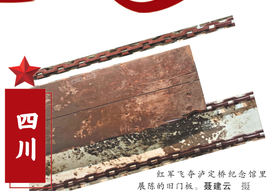
1975年，红军长征帽徽纪念馆筹建时，工作人员邀请毛泽东警卫员吴吉清、周恩来警卫员范金标等老红军寻访驻地旧址。他们记得驻地在寻甸，却说不出具体地点，最终帮他们锁定那个院子的，是一只八音钟，现陈列于红军长征帽徽纪念馆。

1935年4月30日，毛泽东等住进杨家大院，警卫员被八音钟报时的钟声吸引，悄悄带上它，想让前长们有个报时钟。5月3日抵达皎平渡，钟声忽然响起。毛泽东十分生气，责令立即送还。可那势紧迫，几位领导人凑出两块大洋，托付江边一户人家，待大军过后将钟送回。后来，这户人家信守承诺，将八音钟安全送回杨家。

1975年，两位老警卫员聊起往事，无意中提到八音钟模样。工作人员辗转找到杨家后人确认后，老警卫员实地辨认，认出了这个钟。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铁纪，就这样凝结在一只辗转百里又去而复返的八音钟里，成为纪念馆最珍贵的精神坐标。

瑞金



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里展陈的叶只板。聂建云 摄

『民心门板』助红军飞夺泸定桥

本报记者 聂建云 汪国锋 冷寒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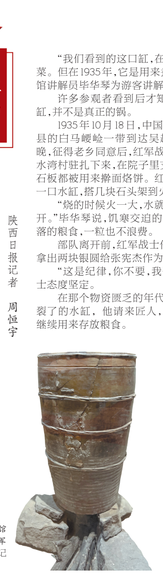
站在泸定桥头，大渡河的轰鸣声穿岸而过。川西小城泸定的军流与人声里，始终回荡着91年前那场飞夺泸定桥战役中军民同心跨越天堑的时代回响，这段历史正是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生动诠释。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先遣队强渡大渡河后，主力部队仅靠几只小船难以快速渡河，尾追之敌步步紧逼，中革军委当即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侧机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昼夜奔袭240里抢至桥头，却发现东岸守敌已拆去桥上近八成木板，13根铁索光溜溜的铁索下，是奔涌的湍急激流。

筹集铺桥木板的过程里，红军战士严守群众纪律，借用一块木板就留下一块银元，如果老乡家中无人，就把银元放在灶台、用水瓢盖住，确保老乡回家生火做饭时就能发现。正是秋毫无犯的严明作风，打消了当地百姓此前因国民党谣言产生的疑虑。家住河西街的卢献云第一个前下自己家门板送到桥头，越来越多百姓自发拆下门板支援红军，一块块“民心门板”在铁索上连成了绝境中的生路。

5月29日下午，22名夺桥勇士攀着铁索边冲锋边铺板，冒着枪林弹雨冲破敌人点燃的火海，经40分钟激战成功夺桥，让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大渡河。

长征路上的一块块门板已不只是渡河的工具，更成了军民生死与共的最好见证，印证着人民从来不是胜利的旁观者，而是创造历史的力量。



吴起革命纪念馆馆藏革命文物“红军锅”。陕西日报记者 周恒宇 摄

陕西

一口红军锅，铁纪赢民心

陕西日报记者 周锐宇

“我们看到的这口缸，在吴起常用来盛水或腌制酸菜。但在1935年，它是用来煮饭的……”吴起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毕华琴为游客讲解红军锅和红军的故事。

许多参观者看到后才知道，红军锅其实是一口水缸，并不是真正的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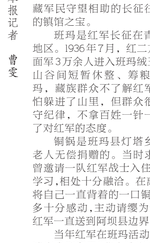
1935年10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从定边县的白马崾岘一带到达吴起头道川的铁边城。19日晚，征得老乡同意后，红军战士在吴起镇（今吴起县）街水湾村驻扎下来，在院子里支起锅做饭。人多锅少，连石板都被用来搬面烙饼。红军战士向村民张宪杰借了一口水缸，搭几块石头架到火上，就成了一口锅。

“饿的时候火一大，水就干了，再一加水，缸随之裂开。”毕华琴说，饥寒交迫的战士们赶紧从地上捡起掉落的粮食，一粒也不浪费。

部队离开前，红军战士仔细清洗了破裂的水缸，并拿出两块银圆给张宪杰作为赔偿。张宪杰坚决推辞。

“这是纪律，你不要，我们就违反纪律了。”红军战士态度坚定。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张宪杰舍不得扔掉这口裂了的水缸，他请来匠人，用胶泥和竹条将它箍好，继续用来存放粮食。



1966年，吴起革命纪念馆筹建，工作人员在乡下收集革命文物时，张宪杰把这口缸捐了出来。1992年，陕西省文物鉴定小组将这口缸认定为国家三级革命文物，它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锅。

如今，在吴起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实物陈列+3D演绎+沉浸式体验”的多元展陈模式，全景式展现长征波澜壮阔的历程，“一口红军锅”等10余个红色故事被深入挖掘、创新讲述。



《什么是红军》传单。资料图片

湖北

老百姓守护红军传单四十余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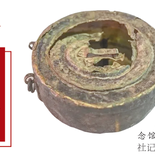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 曾雯

在湖北省鄂西县档案馆，一份泛黄的油印传单静静陈列。它纸张粗粝、墨迹微淡，却字字千钧。这是1934年12月，红二十五军进入鄂陕边地区不久，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兼宣传科科长刘华清连夜刻印的《什么是红军》传单，全文400余字，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名义印发。

传单开宗明义：“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它用质朴的语言阐明红军的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是“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传单更特别指出：“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

这份革命宣传“说明书”，把“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写进纸里、刻进心里，兑现于行动。传单印发后，红二十五军在鄂西刷标语、贴传单、入户分发、田间解读，让革命的种子落地生根。

1935年5月，红军撤离丰玉才因母亲病重回乡。离队前班长将一份传单交给他珍藏，他将传单交给妻子刘立英保管。红军主力北上后，反动民团多次上门搜查，将刘立英绑起来拷问。她把传单夹进家里，塞进土墙缝隙，用泥巴糊平，面对酷刑始终只有3个字：不知道。这一守，就是46年。1981年，刘立英将仅边角轻微受潮、主体完好的传单捐献给鄂西县档案馆。



班玛县红军湾纪念馆的红军锅。新华社记者 张龙 摄

青海

铜锅相赠患难与共

本报记者 曾雯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班玛县红军湾纪念馆，一口锈迹斑斑的铜锅静静陈列。它直径约20厘米，高约10厘米，锅体边缘破损，锅身留有修补痕迹，但浮雕纹样依旧清晰，外壁鳞刻比翼鸟，锅底刻着的“百年借老”四字清晰可辨。

这口诞生于清末民初、原本作为新婚贺礼的铜锅，曾跟随红军战士翻越雪山，见证了1936年红军途经班玛时，汉藏军民守望相助的长征故事，是纪念馆的镇馆之宝。

班玛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区。1936年7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3万余人进入班玛城玉地区，在高原山谷间短暂休整、筹粮。红军初到班玛，藏族群众不了解红军，有人因为害怕躲进了山里，但群众很快发现红军严守纪律，不拿百姓一针一线，慢慢改变了对红军的态度。

铜锅是班玛县灯塔乡班前村的求保老人无偿捐赠的。当时求保的父亲豪多曾邀请一队红军战士入住家中，他们互相学习，相处十分融洽。在离别时一名红军将自己一直背着的一口铜锅赠予索多，索多十分感动，主动请缨为红军当向导，将红军一直送到阿坝县边界。

当年红军在班玛活动20余天，在子木达沟岩壁留下“北上响应全国抗日反蒋斗争！”的标语，这条山沟后来被群众亲切地命名为红军沟。这口铜锅被称为红军锅，它把“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留在了高原的山水之间。

宁夏

红军粉成为特色富民产业

本报记者 聂建云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将台堡会师纪念碑。资料图片

秋日的宁夏西吉天高云淡，站在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内，百年老榆树从古城墙瞭望台破墙而出，静静守望90年前那场彪炳史册的胜利会师。这段奋斗历程，正是对伟大长征精神中“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的深刻践行。

将台堡自古是古丝绸之路的军事要塞与商贸通衢。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长途转战至此，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万余名官兵在将台堡东侧广场举行盛大联欢会，这标志着红军长征史上最后一次胜利会师完成，历时两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正式胜利结束。

90年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始终在长征精神的滋养下勇往直前。历史上西吉所在的西海固地区，山高坡陡、雨水稀少，曾是全国集中连片特困程度最深的区域之一。一代代西吉人传承红军不怕艰难险阻的奋斗底色，翻掘国家“三西”扶贫开发部署，先后完成6次大规模移民搬迁，累计迁出超百万群众，同步实施“南引泾河水、北调黄河水”的治水方略，推进退耕还林还草、生态修复工程，让曾经的黄土沟壑逐步走向生态良性循环。

当年红军途经兴隆镇时，尊重当地回族群众的信仰与风俗，手把手教群众用粉勺漏制粉条，被百姓称为“仁义之师”。如今，传承下来的红军粉早已成为当地带动群众增收的特色富民产业。一代代西吉人赓续红色血脉，在这片曾见证伟大远征的土地上，持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河南

见证长征出发的银杏树

本报记者 赵相康



何家冲村是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资料图片

河南省大别山西端的鸡笼山西北坡有一个名叫何家冲的村庄，村子中有一棵800多年的银杏树。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宣读了《长征出发宣言》，平均年龄只有十五六岁的红二十五军将士在此集结，开始长征。

1931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初建，军长旷继勋是贵州人，初建时下辖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3个团。1932年11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重建。

作为一支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部队，红二十五军又被称作“娃娃军”，干部战士主要由红军家属和烈士子弟组成，年龄大多在13岁到20岁。战场上，红二十五军英勇善战、浴血拼杀，部队战斗力极为强悍。

红二十五军被誉为“北上先锋”。离开何家冲，他们一路西进北上，跨过平汉铁路，血战胜树镇，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出伏牛，进陕南，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是最先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

当地百姓介绍，长征出发前几天，红军为了不打扰村民，都在露宿在半山腰上。乡亲们目发从家里拿出衣被，右村里的磨盘上碾米磨面，送给战士们做口粮，结下深厚的鱼水情。

1996年，这棵见证红军长征的银杏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誉为“中原大地上的绿色纪念碑”。如今，何家冲村有26处红军遗址，每处都有街马灯的传奇，村民们大都能讲出几处遗址的红色故事。

甘肃

诉说军民情的银质印章

甘肃日报社记者 蔡文正



故藏于迭部县博物馆的印章。迭部县党史办提供

在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博物馆，陈列的一枚银质圆面的印章格外引人注目，印章中间刻着麦穗和稻穗围绕的地球，上有镰刀、斧头，沿边刻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财政人民委员”的字样。

这枚大印在2000年8月经国家文物局专家组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一直被珍藏在迭部县博物馆。

1935年9月，红军长征途经迭部，在当地土司的支持下，在榷吉合得到重要的军粮补给。1989年夏天，迭部县电苏镇麻古村村民安吉在翻修房屋时，从房顶上发现了这枚红军印章。

据考证，长征途中林伯渠担任中革军委征发委员会主任，并兼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他的生平按符包里面就装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印章，这枚珍贵的印章正是他在长征途经迭部时遗失的。

这枚印章见证了红军长征途经甘南时的历史足迹。从椎古仓开仓放粮到脚子口天险突围，每一个历史坐标都诉说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浴火重生的壮丽诗篇。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抵达迭部县高吉村，召开了著名的俄界会议。

随后，红军抵达洪日那村，毛泽东同志在此居住，指挥了夺取腊子口的战斗。当地群众冒着风险为红军送粮带路，椎吉仓开仓放粮，解了红军燃眉之急。9月16日，红军先遣部队在毛泽东等领导人指挥下，一举突破国民党重兵把守的腊子口天险，打开了通往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胜利之门。

本版责编：黄蔚 陈曦 姚曼 版式设计：赵怡 王子琪 徐小迪